

##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对 20 世纪俄国文论的影响探析

——以什克洛夫斯基、雅各布森、普洛普、洛特曼为例

欧萌莲

(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杭州 310058)

**提 要:**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为 20 世纪西方文论研究注入了一种新的理论元素, 引发了 20 世纪西方文论研究的“语言学转向”, 对 20 世纪俄国形式主义和符号学文论的影响尤为显著。从什克洛夫斯基、雅各布森、普洛普、洛特曼几位文论家的理论中可以看出以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为开端的语言解放之路的发展方向。因此本文将从研究对象、方法和目标三方面深入探讨什克洛夫斯基、雅各布森、普洛普、洛特曼四位文论家是如何继承和发展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 由此也可管窥俄国文论的“语言学转向”的过程。

**关键词:** 索绪尔语言学理论; 20 世纪俄国文论; 语言学转向

**中图分类号:** I0-05

**文献标识码:** A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Ф.Соссюр 1857—1913), 是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奠基者, 也是结构主义的开创者之一, 被后人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他向历史比较语言学所提出的挑战, 为 20 世纪西方文论研究注入了一种新的理论元素, 引发了 20 世纪西方文论研究的“语言学转向”, 被喻为语言学史上的“哥白尼革命”。然而索绪尔的伟大之处在于其影响远远不囿于语言学界, 他的理论已经超乎学科本身, 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研究“范式”。在 20 世纪俄国形式主义和符号学流派的文论演绎中我们难得地发现这样的继承和发展以脉络状呈现出来: 什克洛夫斯基、雅各布森、普洛普、洛特曼几位文论家在索绪尔的启发下都以语言学为研究范式进行文学、文化和艺术领域科学自主的探讨, 使得 20 世纪俄国文论异彩纷呈, 却又呈现出鲜明可循的脉络。

我国著名语言学家许国璋先生所写的《论索绪尔的突破精神》曾这么概括其理论的深刻意义: “……从语言学(也许是一切科学)立说也许是更为重要的。愈是概括的学说, 普遍意义也越大, 解释力也越强; 一时只有立说而缺乏实证, 后人可补充, 也可以修改。索绪尔就是一个例子。”(许国璋 1991: 136) 这个把握肯綮切中, 也与本文的研究重点不谋而合。索绪尔语言学理论至今都保留着活力和魅力, 离不开后人在臧否中对其不断的吸收、借鉴和发展。因此本文拟以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为发端, 顺其流而下, 探讨什克洛夫斯基、雅各布森、普洛普、洛特曼几位文论家是如何继承和发展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来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在对照梳理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语言是如何一步步跳出牢笼, 走向更为广阔的空间; 还能更加辩证地把握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意义; 也为我们学习和运用理论提供颇为有益的借鉴。

### 1 研究对象: 语言—文学—文化的抽象结构

索绪尔的研究出发点立足于还原语言的自主性——使语言成为一个被独立研究的系统，而不是传达或描述个体活动的工具附庸。他不满当时盛行的个体语言学或者描述语言学，在语言学陷入僵化的“历史”、“比较”模式之时提出要将“一切时间的干预都要从这里清除出去”（索绪尔 1980: 118），从而进行语言的共时性研究，即研究语言内部系统固有的抽象规则。这几乎是大刀阔斧一个主张：抛弃语言具体的变体形态（言语），斩断语言纵向关联的所有枝末节，还原语言最纯粹的样子。在索绪尔看来，“语言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索绪尔 1980: 118）——揭示语言符号意义的不是具体的言语，而是超越其上的语言系统，即语言本身。这一主张为语言打开了束缚已久的牢笼，将语言抽象为一个独立自由的个体，回归到语言学研究的中心点。

这个立论点可谓是开天辟地，不仅向历史语言学提出了挑战，作为一种新的认知范式和方法论，它还渗透到其他学科，使得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整个人文学科出现了“语言学转向”——语言学研究由此拓展开无限丰富广阔的空间。20 世纪俄国文论家什克洛夫斯基、雅各布森、普洛普、洛特曼正是在索绪尔开拓的这一空间中，在其抽象回归的认知范式的启发下，以自主性为精神养料，将语言的抽象回归一步步扩展到文学和文化领域。

雅各布森提出，文学研究的对象不是笼统的文学，而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东西——即“文学性”。而文学性就存在于文学作品的语言中。由此出发，雅各布森结合诗歌探讨语言的美学结构和功能，开创了诗歌语言学的研究新视野。

什克洛夫斯基则开始思考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区别，将重心从语言所表达的内容转移到形式上，进而提出艺术自主性的主张。这一主张拓展了索绪尔的理论维度，将独立回归后的语言重新放置到广阔的艺术应用空间中去。在这个空间中，“陌生化”<sup>1</sup>是其唯一标杆，在其引领下，语言获得了更加纯粹自由的灵魂——成为文学之所以被感知为文学的形式所在。

在什克洛夫斯基将索绪尔的语言自主性扩展到文学自主性和艺术自主性之后，普洛普则在文学领域将语言的叙事模式抽象出来，极其简练地总结出俄国民间故事的模型。这种将研究重点从具体的作品转移到同类型作品共同创作规律，探讨其深层结构和转换规则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可以说是与索绪尔的抽象回归一脉相承——具体作品在这里只不过是文学的“言语”，具有普遍意义的叙事模式才是需要探讨的“语言”。

洛特曼的学术视野开阔，成果丰硕，以其独树一帜的符号学研究视角，赢得了世界性声誉。然而其理论的建构之初正是借鉴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他赞同结构主义关于语言在符号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的主张，将艺术视为一种语言，将文化作为语言加以研究，从语言学出发向电影、绘画等其他艺术门类延伸，最后归结到文化学和历史学。在此过程中，洛特曼发现文本与文化之间的联系，“走出昔日语言和艺术文本的狭小天地，将历时、文化、社会亦视为一种‘文本’来加以解读，并努力寻求其背后的深层关系。”（张杰 2017: 355）洛特曼还提出了“符号圈”<sup>2</sup>这一概念，将语言这一对象推向广泛的文化领域，通过符号圈这一动态的系统，克服了索绪尔静态封闭的语言结构观，将语言与生活、艺术、文本有机地融合，使得语言在跳出自身牢笼成为本体的存在的同时，获得一片更为广阔的活动空间，极大地超越了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

## 2 研究方法：二元对立—二元转换—多元共存的结构建立

索绪尔在重新确立了语言学研究对象之后，开始构建这门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他以“两分法”为方法论指导，从语言内部出发静态地考察语言共时系统和结构关系。在其著作里可以总结出四对两分法学术术语：共时语言学与历时语言学、符号意象与符号所指、社会语言与个人语言、横线（连锁）关系与纵线（选择）关系。除此之外，索绪尔还树立了一系列“二

项对立”原则在语言内部寻找差别。在索绪尔看来，“在语言中，每项要素都由于它同其他要素对立才能有它的价值”“语言中只有差异，没有积极项”（索绪尔 1980：168），所有的词语都同反义词对一样存在于“差异网络”中。索绪尔还为这个“差异网络”构建了横组合和纵聚合两个向度。

安妮·伊诺认为索绪尔二元对立的否定机制是“一种抽象的精神机制，它让意义有了永恒的冲动，有了永恒的更新。”（奥托·阿佩尔 1997：130）著名语言学家许国璋也评价道，“索绪尔的二分法研究方法，不仅适用于一门科学，而且使用于诸门科学，因此具有哲学深度。”（许国璋 1991：136）正是这种用二分法构建语言系统，在对立中寻求语言内部普适性规则的研究范式对什克洛夫斯基、雅各布森、普洛普、洛特曼有着重要影响。在其启发下，他们开始注重思考语言、文学、艺术、文化等作为自足系统的内部各要素的架构关系，试图创生出更高的结构。

雅各布森的语言研究范式建立在索绪尔方法论的基础上，但结合自己对于失语症和儿童习语的研究，对之作出了重要的补充和发展。他提出的“极性”就类似于索绪尔所说的横组合关系和纵聚合关系，但是雅各布森用两种本是普通修辞方式的隐喻和换喻构建了语言的二元对立的典型模式。这个纵横交叉的两轴模式不仅克服了索绪尔的句段与联想无法共存的线性状态，还为语言学与诗学的联姻搭建了桥梁。除此之外，雅各布森还注重研究语言的多功能系统，在不同功能的等级排序中研究艺术成分之间的转换，这弥合了共时性研究与历时性研究方法之间的分歧。可以看出雅各布森在构建语言系统时更加看重其动态的功能结构，从早期的音位系统研究到其后建构诗性功能，再至他的诗歌文本分析，其理论给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注入了流动的血液，语言在此获得了一个不受阉割的活动躯体。

什克洛夫斯基也通过“材料—程序”“故事—情节”的二分法构建了一个独立自主的艺术世界，然而什克洛夫斯基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僵化的对立，而是更多地研究其内在的转换机制——他反对机械地将文学作品的内部结构划分为内容与形式，宣称“文学作品是纯形式，它不是物，不是材料，而是材料之比”，认为只有程序才能使材料转化为艺术作品。由此什克洛夫斯基构建了一个由生活向艺术转换的研究架构，其著名的陌生化理论也是基于这个架构，试图打破自动化体验的惯性。什克洛夫斯基的研究方法对结构主义有重要影响，文艺研究的重点被进一步转移到艺术作品的构成要素和表现形式上，即艺术作品的艺术性被提到了第一位。

以普洛普为代表的功能派看起来似乎与索绪尔没有太大关联，其实不然。普洛普正是在索绪尔提出一系列辩证范畴和关系范畴中，产生了系统和功能等既涉及语言内部系统也涉及语言外部系统的辩证关系范畴，在故事领域为语言抽象出普适的架构模型。在分析大量俄国魔幻童话素材的基础上，他确立了故事中十分重要的要素——“功能”，并将故事中的“功能”一分为二——“角色功能—叙事功能”。通过这样的划分，普洛普大胆地把所有民间故事归纳为 7 种“行为范畴”和 31 种固定的因素或“作用”。在他看来，任何单个的民间故事都只不过是把这些“行为范畴”（英雄、帮助者、坏人、被寻的人等）以具体的方式结合起来。这种试图一概而论的果决与索绪尔的大刀阔斧追求语言自主性的勇气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洛特曼深受结构主义语言学方法的影响，也偏爱二分法：他把语言系统确立为“第一模式系统”，而除语言之外的其他文化符号系统为“第二模式系统”；将文化文本分为聚合类型和组合类型；在区分民间口头文学与非民间口头文学时划分了两种交际模式——外向交际和内向交际。除此之外，还从文学文本入手研究第二模式系统，然后再通过提出“符号圈”的概念转向研究文学、历史、宗教、民俗、神话和一般文化范畴的符号本质、运作方式及意义的生成机制等，极大地扩展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应用范畴。正如洛特曼自己所言：“没有

一种孤立的符号系统能够形成文化，不论它的组织结构有多么完善，构成文化的最小机制必须有一对相互关联的符号系统。”（洛特曼 2000：518）由此可见，与索绪尔语言学的方法论不同的是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的研究基点并非是符号本身；他强调的是整体中不同个体间的相互关系和运行规律，也就是文本与文本、文本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洛特曼这里以语言为构成要素的文本成为一个具有开放性的整体结构系统。可以说这在真正意义上为语言打破了牢笼，开拓了无限广阔的活跃空间。

### 3 研究目的：构建独立科学的研究体系

苏联著名文艺理论家巴赫金说过：“毫无疑问，形式主义本身一方面是针对就俄国艺术理论中占统治地位的内容美学的强烈反应，另一方面又是实验精神、对语言学问题的浓厚兴趣、改造旧的艺术心理和艺术程式等的极端表现。”（巴赫金 1998：16—17）正是这种变革的愿望以及对语言、形式研究的强烈兴趣，促成了 20 世纪俄国文论的“语言学转向”：经过了弗·索洛维约夫为先驱的象征主义理论批评，以别尔嘉耶夫、谢·布尔加科夫、舍斯托夫、罗赞诺夫为代表的宗教文化批评，以古米廖夫、曼德尔什塔姆为代表的阿克梅派文论，以赫列勃尼科夫为代表的未来主义的语言学诗学主张，以及格尔申宗、艾亨瓦尔德、伊凡诺夫—拉祖姆尼克、楚科夫斯基等专门批评家的探索后”（汪介之 2004：23），以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为观照，迎来了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文论的热潮——20 世纪俄国文论在“语言学转向”的潮流中焕发出新的生机。

索绪尔语言学的根本使命是促使语言摆脱历史比较和内容表征的牢笼以获得自主性地位，并进一步深入研究语言的内部系统，掌握语言系统的抽象规则。由此语言学研究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研究学科。这对 20 世纪俄国形式主义文论有着振奋的启迪作用：恰如语言学所面临的困境，20 世纪的文学也面临沦为工具的噩运。以什克洛夫斯基和雅各布森为代表的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正是在这种危机中寻求文学研究的新范式，企图冲破文艺学的条条框框，把文学研究转变为一门科学。追随索绪尔探讨语言自主性和本质的精神，他们也选择了抽象回归的道路——将立论点放置到了文学本身，即放弃一味对文学作品思想内含的探讨，转而对文学自身研究对象和其本质的深层次拷问。

在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启发下，什克洛夫斯基和雅各布森从诗学入手，认为应当把语言学作为诗学系统建构的基础——这就将文学确立为一门语言的艺术，与心理学、社会学、哲学区分开来，促使文学研究独立探索自身的规律与特性，即在艺术中寻找“陌生化”的形式，在文学作品中寻求“文学性”的存在。普洛普将语言学的方法运用到童话故事的结构剖析中，试图解析出俄国童话故事的结构和类型；洛特曼通过探求语言的多功能性将触角伸向文化领域的四面八方，构建起文化的多元架构，建造了一个符号系统，将语言与更广阔的整体结构——“符号圈”——联系起来。在这一过程中语言自身的牢笼、语言与文学的牢笼，语言与文化的牢笼统统打破，成为一个内在整体联动的自由系统。

由此可以看出，什克洛夫斯基、雅各布森、普洛普、洛特曼在继承和发展索绪尔理论的过程中，始终没有放弃对“语言”这一要素的思考。在索绪尔的影响下，20 世纪的俄国文论开始自觉将语言学与诗学结合在一起，既运用语言学知识来研究诗歌和其他文学问题，又将诗学研究引入语言学领域，这不但拓展了 20 世纪俄国文学研究的理论视野，也更新了其研究的方法，促使研究体系走上独立科学的完善道路。

### 4 结束语

从索绪尔开始的破旧到什克洛夫斯基、雅各布森、普洛普、洛特曼的立新，他们一直在试图打破束缚语言的外部牢笼，向内寻求最本质的东西，饱含对语言“自由艺术性”的追求。然而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这样的笃定在有些时候不免容易走入另一种牢笼中——正如我们

已经看到的，为了揭示语言的性质，索绪尔不得不将历时性因素悬而不论，仿佛一个追求极致黑白对立的画家，对语言多彩动态的一面视而不见。后来的什克洛夫斯基则存在过分强调程序而忽视材料的问题；雅各布森在分析诗（文学）的文学性时，过分重视事实分析而忽视了价值判断，使诗歌散失诗意的美；普洛普在试图概括叙事普遍模式时忽视了文学作品差异性。这恰恰说明了每一门学说在披荆斩棘的创立之初总会有不完美之处；这种不完美恰恰代表了一种使命和责任感——追随其后的研究者要做的就是取精纳华、矫枉过正并推陈出新。

本文对于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对于 20 世纪俄国文论影响的梳理只选取了什克洛夫斯基、雅各布森、普洛普、洛特曼几位文论家为参照，固然存在不尽详实之处。然而这样的参照可以开辟蹊径，为进一步探寻其分支提供一条清晰可循的脉络。在梳理对照中，我们也能对索绪尔的理论探究精神有更深刻地领悟。正如潘文国学者为纪念索绪尔逝世一百周年所写的文章《索绪尔：绕不过去的存在》中所说那样“索绪尔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他是语言学家，也不在于他是哲学家，而在于他是一个语言研究中的思想家，或者说是哲学语言学家。他的具体语言学观点今天也许已经不再重要，但是他的思维方式、或者说他研究语言问题的方法论还是我们今天的宝贵财富。”（潘文国 2013：1）的确，什克洛夫斯基、雅各布森、普洛普、洛特曼对索绪尔理论的继承不是具体理论和方法论的机械运用，而是一种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的启发。在什克洛夫斯基、雅各布森、普洛普、洛特曼继承和发展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可以更清晰地看到理论继承和发展的可能性和局限性，以潜心问道的精神学习前人，以兼容并蓄的胸怀纳百家之说，以独立求索的姿态成自我体系，从而更好地开拓语言和文学的自由革新之路。

## 附注

1 “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的核心概念，也是形式主义者最关心的问题。这个理论强调的是在内容与形式上违反人们习见的常情、常理、常事，同时在艺术上超越常境。

2 “符号圈”，又译“符号域”或“符号场”是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的关键术语，指符号存在和运作的空间和机制，它既是文化存在的条件，也是文化发展的结果。（Lotman 2005：205—208）

## 参考文献

- [1]Чердниченко И.В. Структурно-семотический метод татурской школы[M].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Золотой век, 2001.
- [2]Пропп В.Я. Морфология волшебной сказки. Научная редакция, текстологический комментарий И. В. Пешкова[M].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Лабиринт”, 2001.
- [3]Lotman Y. Translated by Wilma Clark. On the semiosphere[J].Sign Systems Studies, 2005. Vol. 33(1).
- [4]奥托·阿佩尔著. 哲学的改造（孙周兴，陆兴华译）[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 [5]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二卷）（钱中文主编）[M].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 [6]段吉方主编. 20 世纪西方文论[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 [7]胡经之主编. 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下）[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 [8]乐眉云. 索绪尔的符号学语言观[J]. 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1994(6).
- [9]李卫华. 20 世纪西方文论选讲[M]. 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
- [10]潘文国. 索绪尔：绕不过去的存在[J]. 社会科学报，2013(6).
- [11]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高明凯译）[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12]什克洛夫斯基著. 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等译）[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出版社，1989.
- [13]孙彩霞等编. 西方现当代文论要著研读[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3.

- [13]特里·伊格尔顿. 当代西方文学理论 (王振逢译)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 [14]王铭玉, 陈 勇. 俄罗斯符号学研究的历史流变[J]. 当代语言学, 2004(2).
- [15]王永祥, 潘新宁. 历史语言学的终结者和功能语言学的奠基者[J]. 俄罗斯文艺, 2013(4).
- [16]王金龙. 形式范畴与形式批评[M].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 [17]许国璋. 许国璋论语言[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1.
- [18]张杰等. 20世纪俄苏文艺批评理论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 [19]赵爱国. 俄罗斯符号学研究范式的百年嬗变[J]. 俄罗斯文艺, 2016(4).
- [20]赵爱国. 俄罗斯形式主义范式的学理基础[J]. 俄罗斯文艺, 2017(4).
- [21]周启超. 直面原生态 检视大流脉[J]. 文学评论, 2001(2).

## The Influence of Saussure's Linguistic Theory on the 20th-Century Russian Literary Theory

—Taking Shklovsky, Jakobson, Propp and Lotman as Examples

Au Meng-lia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Saussure's linguistic theory injected new theory elements to the 20th-century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which triggered "the linguistic turn" in the research of the 20th-century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It has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theories of the 20th-century Russian Formalism and Semiology. The theory of Shklovsky, Jakobson, Propp and Lotman individually shows close interaction with the theory of Saussure, which liberates the language from its "cage" step by step. Based on Saussure's linguistic theory, this thesis analyzes how the above-mentioned four literary theorists carry forward Saussure's linguistic theory and form their own theoretical system. We can further have an insight into "the linguistic turn" in Russian Literary Theory.

**Key Words:** Saussure's linguistic theory; the 20th-century Russian Literary Theory; the linguistic turn

**作者简介:** 欧萌莲 (1994—), 福建人, 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亚欧语系俄语语言文化研究所 2017 级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 俄罗斯文学。

**收稿日期:** 2018-06-20

**[责任编辑: 靳铭吉]**